

“南山小筑”的尘封往事

潘华信



如今北京西路、长沙路口有座旧楼称“南山小筑”的，毫不起眼，灰灰旧旧，外墙斑驳，宛如一个佝偻老人，历尽沧桑而满脸皱纹。然而，它曾经辉煌过。

八十年前北京路上尽是低矮筒屋，1933年“南山小筑”耸立而起，它气势宏伟、用料考究、钢窗蜡地，显示着非凡的贵族气息。主人是沪上名医朱南山，偕携长子朱小南、次子朱鹤皋，三人联合在“小筑”应诊，门前车流如水，病家踵趾相接，每日门诊数在200~300间。1935年朱南山创办新中国医学院，38年去世后朱小南接任院长，时办学艰难，经费短绌，他每年取私蓄二万银元资助学校。建校十余年，桃李满天下，现今名医教授如王玉润、钱伯文、何任、朱良春等俱出诸其门下。解放后，朱小南主持上海中医学会妇科组、中华医学会妇科分会工作。鹤皋先生移居香港，任香港中国医学院院长、新华中医学会会长等职，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、受聘于上海中医学院为顾问。

1958年我走进“南山小筑”时，它依然余辉熠熠。东厢房小南先生诊室里人头簇拥，川流不息，置放的都是重实的红木家具，壁间悬挂着四幅马愚所写的篆、隶、正、草，配以硕大的镜框。西厢房鹤皋先生的诊室则人去室空，寂静尘封。小南先生的形象气质，无疑在当时是医界翘楚：金丝边眼镜，英国开司米料的长衫，雪白纺绸短衫翻出袖口十厘米，坐定后从容侧身从口袋中取出一金光闪亮的扁薄烟盒，放脉枕边，再拿一方笔挺的格子手帕，轻轻数拍烟盒，神定气闲，功架顶级，于是搭脉开始了……间或楼上会隐隐传来钢琴声，先生环视左右，眉头一皱：“荣发（先生之子，也学中医）又在‘踏钢琴’了，华信，去把他叫下来，学会吃饭本钹要紧。”先生对面坐着袁师兄，负责写方子，两侧师姐记病案，我与荣发、白兔坐在师兄、姐的后面，可以做些小动作。诊间，师母常下楼巡视，珠宝光气的，先生则避开师母视线，暂停闲话，抓紧看病。

先生笃嗜古董，周六下午停诊，学生们轮流陪他去福州路、广东路旧货店淘宝，当时由三轮车工友叫文绍者载去的。据说每次消费约500元，这是天价了。所以，“小筑”二楼客厅里，精致的红木书柜中，除了珍版线装书外，琳琅满目的是明、清官窑瓷瓶，柜顶也架满着未拆封的蓝布纹方箱子。自1960年我随苍师后，依依惜别了“南山小筑”，音讯遂稀。

“文革”中，小南先生罹难，惨不堪言。直到1980年我始有机会重面师母，已奄奄一息了，住在岳阳路上的岳阳医院。其日荣发、白兔来招，匆匆赶到病房，师母已迷糊数日，荣发在枕畔低语：看，谁来望你了？她微微张目，瞟了一眼：“是华信。”口唇稍动，似乎有什么好奇怪的。二十年未趋请安，师母心中依然故我，令我顿时歉疚哽噎。后来荣发远去美国，白兔回加拿大，“南山小筑”只能成了我梦中依稀的殿堂。

所幸先生长女朱南荪教授延续着“小筑”薪火，2003年成立的“朱南荪名中医工作室”，2004年被列为“上海市首席名中医工作室”，遗馨重光，当告慰乃祖乃父，而福祉于百姓的。



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。

没有想到陈升还会写散文小说，而且写得那么有味。

“我想阿嬷双手那么紧密，她的心这么恭敬，哪怕是信封里倒出来的，是一整个海峡蓝蓝的海水，阿嬷应该一滴也不漏地都会捧得住。”我捧着这本书，就像捧着陈升那张老脸，那条触手微温的记忆河流，从皱纹里一束一束挤出来。

是花在你面前绽放，也是一次次心灵的抚摸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他荒腔走板的演唱是在15年前。我在我们小镇上的新华书店里犹豫了半天，终于还是买了一盒《魔鬼的情诗》精选专辑。“我不再让你孤单”——在风中，那种声音，就像咸鱼的滋味，闻起来不怎么新鲜，却是可堪回味，一成为我的私房歌。

他的散文小说同样如此。《阿嬷，我回来了》2009年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后，一时洛阳纸贵，与龙应台的《目送》一并成为台湾地区近年最受欢迎的散文集之一。

这已是他的第九本书了。他说自己更愿意用“写作的人”来标明自己的身

参加朗诵会不计其数，当那晚步出人民大舞台的瞬间，却感到无比怅然。转眼他离开我们整整四年了，这些天更无时不沉浸在对他的深深的感念之中。

由上影集团与市文联等单位联手打造的“纪念孙道临九十诞辰诗歌朗诵会”日前隆重举行，人们用诗和歌缅怀这位卓尔不群的电影艺术家。

作为他的晚辈、学生，有幸与孙先生在银幕、舞台上共过事，他是我自1959年从上戏毕业涉世之初遇到的第一位恩师。尽管在当时乃至日后，他始终不让唤他老师，但我打心里确认，这是一位可以一辈子追随的良师益友，这种笃信是任何称谓都难以涵盖的。果然这种亦师亦友的情谊，48年来滋润、温暖着我，曾激励我们并肩穿越阴霾，共迎曙光……记忆的闸门一旦被情感的波涛撞开，迸发的能量是惊人的！当我念诗人汤昭智的《没有谢幕的时候》诗中“不停留，是为筹拍一部新片而忙碌还是为组织一场朗诵会而奔走”时，尽管语句平实，心潮却波瀾起伏难以自抑，诗人勾勒出先生奋成一生的缩影，尤其是晚年的终极追求。他想做的事太多了：一直欲拍电影《三国》、《灭亡》，为筹拍电视剧《闯荡西班牙》。亲自出访、改稿……他是多么期盼张罗成功一场朗诵会啊！出面联络作者和演员，连节目单都拟好了。多少次深夜听他在电话里详尽描述对朗诵会的构思，不时被自己的奇思妙想引发，得意地笑出声来……醇厚的声音、微喘的气息犹在耳边，真觉得他并未走远！重温他对朗诵的解读：“……诗，不再只是环流于心底的孤独的潜流，她插上了声音的翅膀飞向听众，引起交叉共鸣的回响。”如今我们老中青三代电影人正用他挚爱的艺术样式来怀念他，从心底流淌出来的诗句与听众的交流互动所引起的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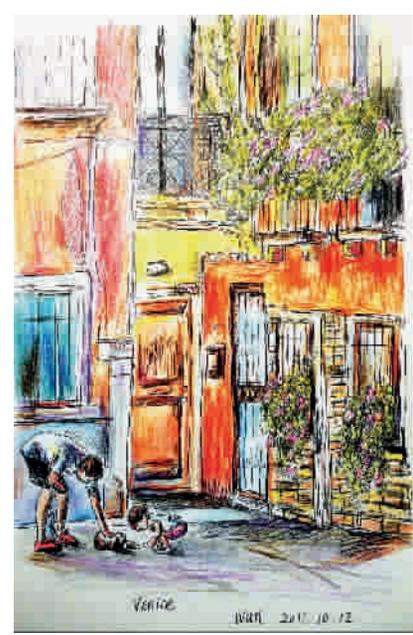
鸣，让我真切感应到他所发射的层层电波，顿悟到自己正继续承受着他的恩泽，接受先生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教导，永不消逝。

感谢中唱上海公司出版了《孙道临演唱十首中外名曲》CD，使我辈得以集中聆听斯人歌声。“我的太阳”、“菩提树”、“花非花”……富有穿透力的华美歌声，在钢琴衬托下，显得如此辽远、空灵，似天籁之音洒落人间。“天妒英才”啊！我边听边想，令人不胜感慨：遥看当今中国影坛似孙先生这般能演能导能写能诗能歌，将毕生奉献给电影事业、兼具学者气质和诗人风度、德艺双馨的全能型艺术家能有几个？！凝想中，传来“铃儿响叮当”飘逸而动感的前奏，他将中文歌词镶嵌在熟悉的旋律中，闪烁着俏丽的光泽。听！那是李侠的声音，萧润秋的声音，还是江梅清、觉新的声音？那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“王子”孙道临的声音——他本身就是一首如歌般的诗，如诗般的歌：“叮叮当，叮叮当。铃儿响叮当，我们滑雪多快乐，我们坐在雪橇上，飞奔向前方……”

当晚，我果真做了个梦，色彩斑斓、诡异奇幻，

梦中那位快乐长者驾着雪橇，在银色世界里驰骋，高歌猛进，一路追寻他心中未竟的梦去了！醒来奋笔疾书，写下以上文字，藉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和祝愿；也许苍穹间自有特殊的邮路，通过神奇的波段将这份情愫发送……

苏向宁



阳光微熹的威尼斯早晨，父子两在自家门前逗一只小猫



电梯逆行，火车追尾，数不清的矿难，央视大火，上海大火，楼脆脆，桥垮塌等等，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，我们处在一个事故的高发年代。而事故，可以说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责任事故。

现在聊责任心的问题，肯定是老调重弹，早就不时兴了。遇到倒霉事，相关领导下台，老百姓等着赔偿，更多的人每天早上出门，自求多福，心里一点底也没有。这样的生活真不知有什么幸福可言。

我年轻的时候当过护士，有一次把病人左眼的药水洒到右眼去了，眼药水是阿托品滴液，有放大瞳孔的作用，当即被定为差错。结果是大会讲小会讲，我一遍遍做检讨，还是被隔三差五搬出来当反面教材，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。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，以后凡事自肃自查，不敢有半点马虎，属于被人嘲笑的那种太过认真的人。

现在的情景跟当年大有不同，也许是金钱挂帅的原因，钱少的行业好像可以理所当然地不负责任，电梯维修工根本请不到；老人院里的护工可以

打老人，尤其是患痴呆症的老人；护士也可以张冠李戴，病人输完液发现输液瓶上根本不是自己的名字；矿井内瓦斯超标，照样敢把人派下去开工等等。估计问责制也没什么用，我是穷人我怕谁？老子早就不想干了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

报纸上每天都在攀富炫富，兢兢业业基本就是傻子的代名词。如果一个社会，负责任的人完全不能得到尊重，责任事故将屡禁不止。我们就只能生活在危险之中了，无论你有多少财富。

我们当然尊重资本，但也不要忘记尊重品质。这个世界有富不仁，也一定有穷凶极恶。把大多数人逼急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，事已至此，问责当然必须从官员开始，无论调离，升迁，退休甚至出国，该负的责任都不能幸免。既然赖昌星走掉12年都没赖掉什么，那么官员的问责也应该如影随形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责任事故。但是提倡认真负责的风尚却是全社会的事。群众的觉悟比领导高，这是一个真理。只要不出现误导，人人以责任心强为荣，那时再谈幸福不迟。

问责制

张欣

创作历史画《新四军——车桥之役》，劈头就碰到一个问题：如何处理历史感与现场感。

西欧美术史上那些著名的历史画，大手笔，画面上不管采用的是虚拟的、象征的还是真实又自然的手法，其中人物的动态、表情、相互关系，以及所出现的物象、环境均要有必要的深刻的与真实的描绘。在军事历史画中，那战场的隆隆炮声，滚滚硝烟，那枪林弹雨，刀光剑影和血流成河的场面、作战双方攻防的胜负最后一刻等……都围绕主题，进行有节奏的深入刻画。

我在进行正稿绘制的准备阶段，就获知一个信息：上海电影集团《可爱的中国》摄制组正赴江西实地拍摄。考虑到红军的服装布色与式样和新四军只是帽子差异。国民党士兵服装布色近似日本士兵的服色。更重要的是电影拍摄中剧组追求真实性，经过化妆与现场的“战斗”过程，士兵身上、脸上、手上、作战道具上的污秽、血渍、土迹；被子弹击破的沙袋；损坏的弹药箱；那种断垣、碎瓦、破砖与焦土……这是战争历史创作中最重要的素材。

战争中的“红军”与“国民党军”双方有江西南昌武警部队的战士替身。为了能在拍摄间隙时让“红军”战士与“国民党军”士兵们为我所用，让我拍摄所需要的动作、姿势和表情。我还特地拜访部队领导，给他画素描头像，以换来他的战士们能与我有机配合与协作的配合，使我搜集到不少高品质的宝贵创作素材。

对于历史画的现场感。我上浙江美院附中时就浏览了大量的苏联画册。从俄国十九世纪油画大师克拉姆斯科依、希施金、列宾、列维坦、谢罗夫、佛鲁别尔、柯罗文、科尔热夫、科林、雅勃隆斯卡娅、马依辛科、格里戈利也夫等，他们虽然表现手法均写实，可风格不一，特点不同。然而上述的大师们都具有十分成熟的画面掌控能力与表达智慧。上世纪80年代赴法留学期间拜读了中世纪、文艺复兴时期、十七、十八世纪弗拉芒与西班牙绘画、十九世纪的法国绘画，尤其是十九世纪欧洲学院派油画大师的原作，使我对油画有了新的认识，那些严谨的写实技法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特别是拜读了大量的法国“学院派”的巨作之后，令我震惊与振奋。十九世纪欧洲绘画史中“学院派”绘画是绝对的主力，他们的塑造能力、色彩与素描成功融合的能力、对重量、质量与空间操控的能力，应该说是达到了写实绘画水准的顶峰。这就是我确立后来的绘画风格的原因。

当站在《新四军——车桥之役》的画布前正进行绘制工作时，不禁让我想起浙美附中学生时代教我风景素描的林以有先生。当时他觉得我的风景素描不错，告诉我说，别人都以为画人是最重要的，其实风景画同样重要，风景画尤其讲究天与地、远景、中景、近景之间的空间关系的把握与营造。真正能画好风景，将来画大的场面就能胸有成竹了，比如画“淮海战役”，就等于在风景画中放入人物，林老师的这番点拨，激励我从经常作小幅风景素描。今天，当我站在大画布前，我确实自感胸有成竹，始终能清晰地掌控巨大的画面。

由于大型历史画是用画笔书写历史，是力图展现最真实的历史感和现场感，所以必须倾注全部的心血，力求完美。我要让人物的神态、动作达到最大的表现力，要在二维平面中制造最理想的三维空间，要在硝烟弥漫中抓住一瞬间的定格，这是我作历史画的一个重要观点。

我与历史画 明请读一篇《寻找“郭兴福”》。

历史感与现场感

徐芒耀

份。从他写出第一个故事的那一个午后开始，他就不再单纯是一名“歌手”，身份更为多元，而文字更为纯粹。《风中的费洛蒙》比《阿嬷，我回来了》早一点出版，短篇小说集。一点排练时的小情绪，一座已经停摆的钟，被陈升放大，成了一些若有若无的片段，好像费洛蒙不仅在风中，也在书里。

一花一世界

河西

有吗？没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说不清楚道不明的一种情绪。你听，它在说：“这种天气，直叫人心浮气躁啊！更何况，风中还充满了费洛蒙。”

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？还是喜欢万芳唱过的：“我唱歌，你听不听，都是我的。”陈升何尝不是如此？不过，相比之下，我情感的天平更倾向于《阿嬷，我回来了》。也许因为散文这种文体，写的都是陈升童年时真实发生的故事，情趣盎然。吃下蛇蛋后怕不已的陈升，远远地就对着凤凰树大喊：“阿嬷，我回来了！”那喊声，会不会像村头喇叭里断断续续悠扬又喜悦的歌声，高高地挂在凤凰树上？这样的童年，

凤凰花和紫云英开遍灿烂的童年，是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如今擅自老了的陈升一边将大肚躺往丹田里吸，一边抚摸着自己的少年时代，一定也是百味杂陈。

一花一世界，每一朵花都是一段生命的旅程，牵牛花旅行到墙根下，被丧事看中的桃树上挂满了冥币，朦朦胧胧喜欢过的秀媛没有成为陈升牵手一生的女人，默默地走在扶桑花燃烧的野地里……那些充满生命质感的细节和诗意的文字，没有华丽的欲念，在我看来，较之于他试图端起讲故事架子的《风中的费洛蒙》，更为温暖，也更及物。

“夕阳红彤彤的，很像是妈妈塞在饭盒里的咸鸭蛋。”没有写在歌词中的诗意，出现在书籍里也是好的。这是老顽童陈升的喜悦与淡淡的感伤，他说：“我永远都没有来得及跟昨天的我道别。”这感伤的话我更愿意解读为他从来也没有长大。正如我们在陈升的音乐中看到的嬉戏与玩耍一样，还记得他在《风箏》中唱过的吗？——“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，所以我将线交你手中，却也不敢飞得太远。”每一朵花就是陈升手中的风箏，它们远在天边，似乎又近在眼前。

有些老男人越老越猥琐，有些老男人，越老越有味道，陈升显然于后者。

